

泉州文史資料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泉州市委员会文化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新十五辑



泉州文史资料

新十五辑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泉州市委员会
文化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一九九七年十二月



封面题字：梁披云
封面设计：林剑仆
责任编辑：傅 乌
王明健

泉州文史资料 新十五辑

编 辑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福建省泉州市委员会
文化文史资料委员会
印 刷：泉州晚报印刷厂
批准印号：泉新出字0014号

工本费：6.00元

目 录

关于《我爱我的台湾》一场争论的始末 万国智(1)

郑成功安平遗迹浅探 方 圆(10)

天使的奉献

——记“克癌斗士”潘明继

..... 黄明福 吴业枢 陈德芳(28)

画家黄达德 叶海山(37)

漫漫长路赤子心

——回忆我的人生历程 黎 扬(44)

菲律宾爱国华侨王汉杰二三事 李国宏(58)

王济弱的革命生涯 李远荣(62)

难忘的血泪史

——旅缅华侨吴素生的沧桑经历 吴灿辉(69)

贤达好义 爱心可鉴

——记信义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贤义

..... 王明健(76)

香江那片晓帆

——香港诗人晓帆剪影 郑天采(84)

贵峰诗村巡礼

——侨胞王国明先生创办诗村事迹 ... 王赎回(87)

功勋满桃源 史笔写春秋

——永春侨乡域外情长篇 郑流年(92)

塘东盛世修村志 李 原(104)

永春讨袁护国英烈潘节文事略 许梦飞(109)

惠安志士在闽海抗日中的贡献

..... 张家瑜 庄其章(111)

台湾“四六”事件 吴 文(121)

梁庙家属 33 人蒙难经过及其墓志铭 李天锡(125)

1951 年晋江地区军民围歼海匪的巨大胜利

..... 郑炳山(130)

《陈三五娘》是怎样跨出省门的 沈继生(140)

抗日战争中的泉州木刻美术 陈 枚(145)

奉圣宫与雷海青 吴 文(150)

东观西台六百年变迁述略 吴捷秋(155)

关于《我爱我的台湾》一场 争 论 的 始 末

万国智

1988年11月,我迁居泉州刺桐学村,有机会结识潘玉仁先生。其时潘玉仁先生从石狮退休回泉州,应聘创办刺桐学村邮电代办站,同时兼职一些中专职专幼教专业的音乐课程,同时也撰写一些回忆录式的文章。他是晋江市政协文史委员。

潘玉仁先生多次讲述创作《我爱我的台湾》(歌词)经过和导致政治上的不幸遭遇,引起我的注意,也引起我的同情。我产生一个意念,帮助潘先生澄清这首歌词的真实,还给历史原貌。当时尚无“知识产权”一说,也不见文艺上法庭的先例,所以只能通过报刊给予披露;另一方面,我不能不考虑到,杨扬先生是位老音乐家指挥家,在我省音乐界有一定威望,不可因为不慎而损害他的声誉,造成不必要的负效应。鉴于上述种种原因,我再三斟酌了史实和材料,再三推敲成文的字句。按我的本意,只要证实《我爱我的台湾》一歌的作者是谁,辨清该歌在漫长岁月里铸成的误解,目的也就达到了。潘玉仁先生对此也不表示异议。

“翻案”文章写成后,我想投给一家比较有影响的报刊发出。因为《我爱我的台湾》一歌诞生半个多世纪,流行极为深远,不用说在电台、电影、舞台、乐团、歌集中表演或出版,就在普通百姓(尤其是闽南语地区)基本上人人会唱,它对于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产生的意

义也是不可低估的。于是,我于1990年春节期间,把稿子寄往上海《文学报》,我认为,该报可以胜任我在前面提及并私许的“任务”。

《〈我爱我的台湾〉的来龙去脉》一经推向社会,毫无疑问引起一定程度的轰动,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《音乐周报》、光明日报社的《文摘报》首先转载,随后广东、河南、福建等省地报刊也摘载或报道。这自然引发了不同看法,争论就此爆发,时间延续将近一年。

厦门市文联由陈元麟先生率领的专题调查组,通过对厦门泉州有关部门和人员调查之后,在1990年9月17日《厦门日报》上,动用大半版篇幅刊行长文《也谈〈我爱我的台湾〉的来龙去脉》,指责我的“失实”,乃至失误、失策,其观点仍是《我爱我的台湾》作者系杨扬先生(说是整理者也行),问题则在于厦方提不出充分的有力的证据,但反驳文章扩散的影响是肯定的。

既然如此,再作“回复”成为完全必要。出于慎重起见,我除掌握原有资料外,又特地访问了庄炳章、杨波等几个离休老干部。抗战时期和解放初期,他们在泉州参与或领导文艺工作,提供了详实证明,使我以充分把握再次写作《终局归于事实》一文。值得一提的是,《泉州晚报》总编施能泉、副刊部主任叶梓赋、专刊部主任万本培等诸位,关键时刻给予有力支持。该文于1991年4月22日发于《泉州晚报》,在此之前,《泉州晚报》还转载了《文学报》的《〈我爱我的台湾〉的来龙去脉》。有了这个版地,有了各方面的支持,至少使我摆脱“孤军作战”的困境。

1991年4月25日,《文学报》选摘陈元麟的《也谈〈我爱我的台湾〉的来龙去脉》,其意很明确,杨扬先生长期署名的《我爱我的台湾》一歌是“捡”到的,过去的有关署名、版权等是“误会”所致。那么,这一场争论也就有了一个温和而确凿的“结论”。

时隔6年,我把这些材料整理起来,交付《泉州文史资料》。我认为,对于《我爱我的台湾》这样一首著名歌曲,属于泉州作者属于

泉州人民的光荣,后来又发生这样一场争论,是有必要保存于泉州史册,至少给后人留存一份史料一个借鉴,是有其特殊价值的。

1997年7月《泉州政协报》社

附件:

是民歌? 还是创作歌曲? 作者是谁?

《我爱我的台湾》的来龙去脉

万国智

闽南语歌曲《我爱我的台湾》问世之后,历时半个世纪,至今在国内外盛传不衰,老少男女皆能知晓。

《我爱我的台湾》究竟属何种表现形式?有标为“台湾民谣”,有标为“闽南民歌”。现在可以认定:《我爱我的台湾》是创作歌曲,因之不能不涉及作者问题。已往的文字记载或演出报幕,向来说是“杨扬改词、思游记谱”,实则是个大误会。原作者应为潘玉仁先生。

潘玉仁先生原是石狮市宽仁小学音乐美术教师,现今退居泉州,年青力壮时喜爱歌曲创作,结合课堂教学需要,创作了一些儿童歌曲,40年代由福州改进出版社出版的《儿童歌曲》、《小学音乐教材》其中就有数十首他创作的歌曲。关于《我爱我的台湾》,从写作演唱到出版的始末,他记忆相当清楚,而且手头保存有充分的原始材料。

时光回溯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。那时候,潘玉仁在爱群小学(后改名石狮宽仁小学)供职,受到校中地下党同志进步思想影

响,热情参加反蒋抗日宣传。在一次闲聊中,潘玉仁听到朋友透露,台湾人和“外省人”对现状十分不满。这无意中的议论,触发了潘玉仁的灵感,当即写下“狗去肥猪来”之句。

此后几天里,潘玉仁始终情绪激动,他想以此写成歌曲倾诉台湾人民心声。在他写成之际,老同学施启明来探访,商量改动“有苦没人知”和“目屎(眼泪)在腹内”两处。整首歌词就这样形成了:“我爱我的台湾啊,台湾是咱家乡。日本时真不自由,现今加苦愁。看见狗去肥猪来,目屎在腹内。咱同胞要怎样,何时来报仇?”

全词模拟台湾人口气,依照道道地地闽南语写成。考虑曲谱要通俗易懂,凑巧潘玉仁去看望从台湾回大陆的朋友吴庆年,当场凭听唱记录了台湾酒吧歌曲旋律。这里补叙一下,前几年偶然机会,潘玉仁获悉这旋律出自当年台湾流行歌曲《南都之夜》。

词曲配合成稿,潘玉仁拿到学生中间试唱,效果不错。于是,这首歌曲扩大到民众口头流传,影响日渐深入。

泉州古城 1949 年 9 月解放。知名人士王冬青(即后来高甲戏《连升三级》编导)找到潘玉仁,邀他主编一册歌本,宣传解放。王冬青看了《我爱我的台湾》歌稿,建议补充时代内容。潘玉仁对整首歌的词和曲逐字逐句斟酌调整,又续上一段词:“兄弟啊,姊妹啊,勿免空悲哀;彼当时在地狱内,有苦没人知。如今是人民解放军,要救咱子孙。请同胞着合起来,消灭反动派!”

解放初期,因教学和宣传工作忙碌,潘玉仁将这首歌搁置下来。直至 1954 年 7 月 17 日,他整理材料时翻出歌本,又作过一番修改誊抄,取题《我爱我的台湾》投给《厦门日报》社,希望能予正式发表。

《厦门日报》社文教组编辑于 10 月 9 日回信,言及正在组织一首民歌,“由本报一位同志记录下来,交给本市音乐工作者杨扬同志整理”。大约五六日后,《厦门日报》文化生活版刊登歌曲《我爱我

的台湾》。很有趣，曲及词均为潘玉仁的原作，只不过作精简调整而已，署名变成“杨扬改词、思游记谱”。而杨氏的歌曲《我爱我的台湾》是年载入福建省《歌曲选集》，“一锤”为这歌曲去向“定音”。

如今，重提旧事的不是潘玉仁先生，而是由外界动议钩沉。早在1957年5月，晋江县文联的民间歌谣创作座谈会上，有人议论过，但鉴于潘玉仁1956年整风中受挫而“避嫌”了。1985年晋江县政协召开会议时，知悉内情的老同志提出，潘玉仁委员创作《我爱我的台湾》及其贡献，应载入《文史资料》以作备忘……40年代、50年代唱过潘玉仁先生歌曲的乡亲学生，纷纷呼吁为当年的老师澄清事实恢复著作权，但潘玉仁表明对此“无意苦争春”。

（原载上海《文学报》1990年7月19日）

终局归于事实

——再证《我爱我的台湾》词作者的真伪

万国智

《文学报》1990年7月19日发表《〈我爱我的台湾〉的来龙去脉》（本报9月20日转载。下简称《来龙去脉》），我本意廓清闽南语歌曲《我爱我的台湾》作者真相，复返历史原貌。时隔约两个月，9月17日《厦门日报》推出陈元麟的《也谈〈我爱我的台湾〉的来龙去脉》（下简称《也谈》），声称代表厦门文联调查组发言，“以正视听”。我以为，既然有关“老音乐家的人格和名誉”，慎重务实说话，事态就绝无什么“复杂”可言。

《来龙去脉》一文中，我提供过一个关键人物和一个关键情节，即 40 年代和潘玉仁共事文艺宣传活动的施启明先生，是潘玉仁作词《我爱我的台湾》现场目击者，参与过词句斟酌推敲，并且第一个把该歌唱向社会。1947 年至 1948 年间，他由于传播这歌曲而涉嫌，登入泉州警察局黑名单。不久前，忆及这段旧事，他表示要凭良心告白天下。

另者，1949 年 9 月在泉州美术印刷厂的王竹先生，多次排印校对《中国民歌》和《解放颂》歌集，也可出证。他说，“《我爱我的台湾》歌词确系潘玉仁师创作，笔名‘尤然’”、“稿件系潘师手笔”……类似人与事恕我不多援举。倘若调查组兴趣，他们乐意接受调查。

确认《来龙去脉》及本文所述事实，那么，在《我爱我的台湾》词作者真伪焦点上，《也谈》一文指责我的“失真”也就不难揭秘。

《也谈》作者说，“1949 年的《中国民歌》和《解放颂》两个版本，《台湾谣》均没有署潘玉仁的本名或笔名”。对此，我除了坚持《来龙去脉》中的引证，还想提醒一下，潘玉仁已向调查组递交过“答案”，他以“尤然”笔名主编《中国民歌》一书，收入歌曲一律冠以“××民歌”，原因是自己主编歌本，唯独自己的作品署名，恐怕导致节外生枝的误解，也出于考虑“当时刚解放，尚不敢署名”；随后歌本更名《解放颂》也照此沿用。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，这解释合乎当事人情理。潘玉仁同时向调查组申明，以《中国民歌》出版日期 1949 年 9 月为限，如果厦门方面能找出更先的资料，他甘愿“败诉”。就此而论，《也谈》中抛出的“判断”：“我们无法认定他（指潘玉仁）就是词作者。”该歌曲出处“有两种可能”，显然站不住脚，欠缺力据和可信度。

《也谈》揪住时代背景的“出入”大作文章：“1945 年抗战胜利前夕……当时台湾正是日据时期，狗（指日本占领者）尚未去，猪（指国民党反动派）亦未来，又如何有‘狗去肥猪来’的创作‘灵感’

呢？”应该说明的是，我在《来龙去脉》原稿中有这样一段文字：“时光回溯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，潘玉仁……曾创作歌曲《我们是新儿童》、《一个小兵》、《过新年》，还有《防疫进行曲》、《侨家》等歌剧话剧，热情参加当地反蒋抗日宣传，兴意正蓬勃。第二年……”见诸《文学报》时，具体剧目歌题人名被勾掉，可能编辑为突出“主角”，不慎连“第二年”几字也误杀，原稿在押可供审查。潘玉仁告诉我，和调查组谈话过程，他转达申明过。原本可以释疑，不料《也谈》一文硬调遣为“失真”的首项，除开遗憾之外，我还有什么话可以说？

《也谈》闪烁其辞说，《我爱我的台湾》系“台湾民歌”，所以，潘玉仁和杨扬“都是记录和整理者”。我不想重复搬运材料，“台湾民歌”之说已证实不能成立。何况，潘玉仁持有原始底本和样件，他写成之后试唱试教，印刷歌本投稿报社。过了5年之久，《厦门日报》才发杨扬的《我爱我的台湾》，词曲基本同出一辙，不过是潘氏原产品另换包装另贴标签，“提炼和加工”显然是靠不住的拐杖。

至此，我想商榷若干疑窦，以期顺利解开“死结”。

其一，《也谈》介绍杨扬得到《我爱我的台湾》的始末，是《厦门日报》编辑蔡其英记下台湾艺人颜抬治（艺名赛月金）的唱词，再经杨扬专门邀她到文化局演唱，过后将词曲装配成品。令人不解的是，潘玉仁的歌稿已先期寄达《厦门日报》文教组，莫名其妙“失踪”，而杨氏的却上了版面，居然如之不谋而合？1949年9月10日，潘玉仁主编《中国民歌》及后来更名的《解放颂》歌本，当时出版物尚无正式非正式之规定，只送军管会“共同研究”（歌本编者语）付梓，前后发行数逾万册，民间公开演唱。即使杨扬以听唱整理，应晓得该歌有出处，而且现在原词作者提出证据，又该如何考虑？

其二，我敦请诸位留心，《厦门日报》原编辑承认，“《我爱我的台湾》发表后不久，便接连收到潘玉仁来信，说这首歌词是他创作

的,要求予以更正”。这段话确实重要,至少说明这场争议并不突然。

总之,事实认可潘玉仁是《我爱我的台湾》真正词作者、曲谱记录者,是抹煞淡化不了的。不管中间有何误会有何差池,鉴于已成为过去,适当时间场合形式交还作品主权,符合传统美德,无损文艺家的德高望重。此间无需拉扯《也谈》中再三强调的“责任”问题。

(原载《泉州晚报》1991年4月22日)

《厦门日报》刊载署名文章,也谈——

《我爱我的台湾》的来龙去脉

本报讯 万国智《〈我爱我的台湾〉的来龙去脉》一文于去年7月19日在本报刊出后,陈元麟在《厦门日报》发表文章,也谈《我爱我的台湾》的来龙去脉。

文章提到,据原《厦门日报》社文教组编辑蔡其英回忆,1954年间,该报社文化生活版拟组织配合解放台湾宣传的文艺作品。一天,他在市文化馆遇见1949年前夕从台湾来厦门演出,后来返台湾剧艺人颜拾治,便要求她唱几首反映台湾生活的歌曲。颜唱了《我爱我的台湾》,蔡其英当场记下歌词。接到蔡的记录稿后,杨扬让人请颜拾治来演唱,并将曲谱记录下来,经整理后于1954年9月25日,发表在《厦门日报》生活版上,标题为《我爱我的台湾·台湾民歌》署名为杨扬整理·台湾剧艺人颜拾治唱。

《我爱我的台湾》一歌发表后不久,厦门日报社便接连收到潘玉仁的来信,说这首歌是他创作的,要求予以更正。经蔡查证,潘确

实在7月27日向报社投稿,但由于当时报社一般不刊登歌曲,故被收到稿件的同志作为一般歌曲退还潘。蔡了解此事后,曾怀疑演唱者颜抬治是否将潘的作品当成台湾民歌,便特地再次走访颜,问她究竟是在何处听到这首歌的,她肯定地回答,是抗战胜利以后在台湾听到的。为此,蔡其英请示了当时的文教组长。该组长认为,既然台湾艺人肯定它是流传在台湾的民歌,而潘又没提出足够的证据证明是他的作品,因此,无法按潘的意见更正。于是,文教组便复函潘玉仁,向他说明此稿的处理经过及无法更正的原因。

(原载上海《文学报》1991年4月25日)

郑成功安平遗迹浅探

方 圆

明 朝 姑 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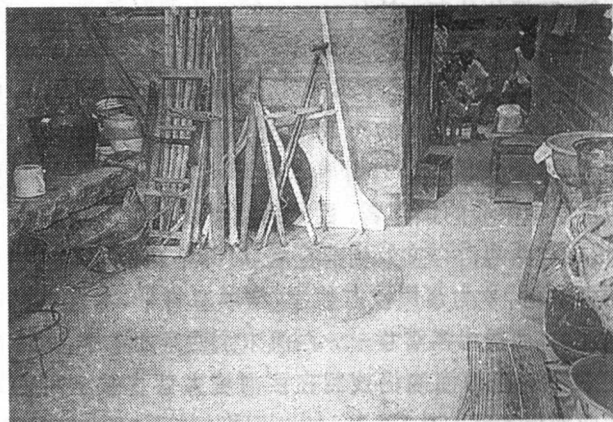
晋江安海星塔前村有三合土古坟一座，墓身呈圆形，宛如一倒覆之大锅，没有墓碑。村民世代相传，称之为“明朝姑墓”。每年古历三月初五和十月十五日，都要焚香祭祀。明朝姑究是何人？据说是郑成功之母田川氏在安海郑府居住时的婢女，她在田川氏遭清兵迫害自尽后殉主自尽，其姓名籍贯不详。

南明隆武二年(1646)十一月，清兵突袭安平(今安海镇)，烧杀奸淫，整个安平镇十室九空，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因不堪忍受清兵之辱而自杀身亡，这位婢女为效忠主人，也随之自尽了。田川氏去世后，原葬于安平，清康熙三十八年，郑成功之孙克塽将郑成功夫妇墓从台湾迁葬于南安橄榄山(又名覆船山)之郑氏祖坟内时，即将田川氏墓从安平移去，一并附葬在郑氏祖坟内。因此，安平仅存留此婢之墓葬。

这座明朝姑墓现在已是在一村宅内之天井中，天井十分狭小。笔者询问此宅主人，为何明朝姑墓建造在此小天井中？主人解释说：这一带地方在解放前叫“坑岬大榕脚”，是星塔村近郊的空旷地带。这里原有好几棵高大的百年老榕树，绿荫匝地，每到夏天酷暑，村民都经常在此榕树下乘凉。附近山野间有不少古墓葬，这座

明朝姑墓是其中的一座。解放后，这一带逐渐有居民兴建住宅，到现在已经成为十分拥挤的住宅区了。原有的大榕树被砍伐殆尽，古墓葬亦多迁徙夷平了，只有这座明朝姑墓仍然被村民原地保存下来。此墓原有规模多大，墓身多高，已不得而知。随着村民建房，地面填高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明朝姑墓，说不定仅是原墓的墓顶尖而已。

关于明朝姑墓的来历，只是在安海当地群众的口头传闻，至今尚不见有文字记载。这种民间传闻，往往是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。按“明朝姑”三字的意思来作一番推敲：“姑”字似是对未出嫁姑娘的尊称，与婢女身份相符，而冠以“明朝”国号，则此“姑”应非普通民妇，其身世当有不平凡的来历。是不是当年的安海人为了崇敬郑成功，弘扬民族精神，将这位坚持民族气节而为主人殉难的婢女的坟墓一直保存下来，以便世代祭祀怀念呢？依笔者之见并非没有可能。但究竟是否属实，尚有待今后对此墓进行发掘考察，或许可能从中发现一些佐证。



△保存于安海星塔村民宅天井中的明朝姑墓。（摄影：方圆）

深埋地下的一门古炮

安海西河境大巷有一户姓林的居民,于1988年间翻建楼房深挖地基时,在距地面约六、七市尺深的地下烂泥中,发现一门古炮,这门古炮现在放存在林家旧大厝的院子中。

此炮炮身已严重生锈,是否铸有文字无法查究。炮口外直径20公分,内直径10公分,厚5公分,全长212公分。炮的尾部甚是奇特,一般炮身头尾都呈圆形,而此炮之尾部却呈扁形,像是“炮柄”,“炮柄”长36公分。据考古专家鉴别,此炮不是陆地炮,而是安装在船上的炮,其尾部扁形部分,是用来把炮身紧固在船上的。现在的问题是:这门古炮是哪个朝代的東西?炮的主人是谁?为什么深埋在这里?

有人认为,这门古炮很可能是郑成功的遗物!

据史记载,郑成功在安平住在一座十分豪华的府第,是其父郑芝龙于就抚后的崇祯二年兴建的,其规模宽广宏大,“亭榭楼台,雕龙画栋,极尽豪华”。郑芝龙还“开通海道,直至其内,可通洋船”,也就是说,船只可以通过他开通的河道,直驶到府内。另据记载,郑芝龙在拆城建府时,还在桥西铺外辟建水关,开挖西河沟,使梢船可以沿西河沟直至城中心的镇官署。西河沟在什么地方?据《安海志·西河沟》记载:“西河沟在文公祠前直港,广深不知,通海水,小舟得到院前两旁余地,今为富民侵占盖屋,沟填塞将平,水自祠前南至后山土地宫前,西折出柯厝巷……西流末至西宫而入于海,今尚云西河沟。”至今这条西河沟仍残留在西河境大巷水关一带的地下。而位于西河境大巷的林家,于1988年间从地下挖到的这门古炮,正是深埋在此西河沟中,据当年目睹挖炮现场的林家主人林阿